

增长极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阶段

张永红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增长极理论是一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协调发展三大阶段,借鉴增长极理论的合理成份,总结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将对我国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极;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即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正进入关键的第三阶段,如何借鉴西方主流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拟以增长极理论为研究视域来审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策。

一 增长极理论概述

“增长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他在著名论文《略论增长极概念》中写道:“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认为,增长极并非地理区间而是抽象的经济空间,它是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个或一组经济部门,而且这些经济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之间的关联乘数效应推动其他产业增长。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将增长极建立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缺乏地理空间的依托,增长极只能是空中楼阁;二是过分强调增长极的积极作用,对其负面影响不置一词。佩鲁的弟子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他把佩鲁增长极概念的内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转向地理空间,赋予经济空间以区域的

地理意义,弥补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第一个缺陷。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了著名的“回浪效应”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丰富和发展了增长极理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回浪效应是指增长极不断吸引落后地区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从而带给落后地区的是下降的循环累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因此会越拉越大;相反,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的发展会惠及落后地区并给它带来的是上升的循环累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因此会越来越小。怎样实现“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以缩小地区差距?缪尔达尔寄希望于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以刺激增长极周围落后地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 A·赫西曼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核心——边缘”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回浪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赫西曼认为在核心区 and 边缘区之间也存在着两种相反方向的作用,即“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市场的力量往往使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不过,赫西曼主张政府应采取审慎的而非积极的干预措施,认为审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增长极理论是西方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认为一个国家特别是较大国家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从一个或

收稿日期:2008-08-28

作者简介:张永红,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人文社科系副教授,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休闲文化研究。

数个增长中心逐步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该理论自产生以来经历了被追捧、责难和反思三个不同阶段,可以说,几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使人们对于增长极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客观的评价。就积极方面而言,首先,增长极理论突破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的缺陷,主张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这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客观发展实际。实践证明,不同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把短缺的资源均衡地分散于各产业和各地区,只会造成区域内的低水平均衡,从而阻碍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缪尔达尔等看到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主张通过积极的或审慎的政府干预达到缩小地区差距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消极方面来看,一是增长极理论强调依靠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建立增长中心。实践证明,政府大量投入并不必然出现增长极,尤其是推进型产业的选择脱离本地的产业基础,同本地的产业没有发生紧密联系,两者在规模上、技术上相差太悬殊,无法形成产业链,资源要素向外扩散的通道受阻,出现产业结构联系的中断,只能形成与周围地区经济相割裂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1]二是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极化效应拉开差距来实现非均衡发展,但这种差距到底控制在一个怎样的范围才是合理的,增长极理论没有论及,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二 增长极理论视域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选择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历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中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如世界银行的专家所言:“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对中国如何有效率地和公平受益地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将起关键作用。”^[2]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能也没有全盘套用西方的增长极理论作指导,但是,以增长极理论为研究视域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能帮助我们借鉴增长极理论的合理主张,并有效地规避它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影响,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不受增长极理论影响却颇似“孤岛经济”的均衡发展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由于受平均富裕思想的指导和冷战时期出于“备战”的考虑,我国选择的是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甚至是平衡发展模式,采取“一平二调”的内地投资倾斜政策,试图通过不平衡的发展手段达到平衡的发展目标。但

实践表明,完全凭借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项目与西部地区传统的社会经济环境不相融合,产业结构联系中断,产业链无法形成,共同富裕的初衷导致的是共同贫穷的苦果。尽管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不可能研读西方的区域经济理论,更不可能用增长极理论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三线”建设的结果却与增长极理论割裂地方经济联系强行推进增长极而导致的“孤岛经济”十分相似。这一事实也从反面说明:其一,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和地区情况出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为了实现经济有效增长,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在某些条件较好的核心地区,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3][155]}其二,虽然增长极的形成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增长极的构建必须根植于当地的经济基础,否则,增长极就可能因为与当地经济缺乏联系而窒息。

(二)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成为最大增长极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实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大阶段,时间跨度上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空间维度上是我国地区经济分为东、中、西三大梯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首先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区内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率先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从增长极理论的角度看,这一举措的实质是利用当时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港、澳、台地区的扩散效应,在其毗邻地区建立完善的投资环境小区,以吸引海内外资金,尤其是港、澳、台资金集中投入区内发展潜力大、投资效益明显的产业和部门,使这些地区与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经济势差,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极。1984年,我国进一步开放了14个经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沿海城市,然后又相继将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将海南辟为第5个经济特区,1990年,开发上海浦东新区,从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三个梯度的经济开放带。开放、优惠的投资环境助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一方面,它利用扩散效应从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极承接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又利用极化效应吸

引中西部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深圳、上海等城市迅速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小增长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经济圈成为东部大的经济增长极,这样,小增长极推动大增长极,大增长极集聚成更大的增长极,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整个东部地区无疑又成为了我国整体经济格局中的一个大增长极,它以不断上升的循环累积效应快速地发展着。同时,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带动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勃勃生机。

(三)借鉴增长极理论,构建我国区域经济新增长极的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大局”的创造性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较快的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277-278}“两个大局”的构想奠定了我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宏伟蓝图。“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4}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标,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实践证明,东部地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它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放大的地区差距日益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社会矛盾之一,这显然有违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世纪之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即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在保持东部地区继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勃兴是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是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宏伟之笔,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是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重大战略决策,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蓝图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然,中西部地区的勃兴和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主要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中西部地区要主动承接东部增长极的产业转移。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东部地区目前同样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问题,各地纷纷调整其发展战略,开始向产业高级化、高增值化的方向过渡,而一些传统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扩散效应初步显现,这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会和空间。中西部地区可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嫁接东部的技术、经济优势,主动承接东部将要放弃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土地密集型产业,并将其培育成本地经济发展的推进型产业。以中部六省为例,在国家中部崛起广域政策的支持下,中部六省雄心勃勃。如湖南主动提出融入珠江三角洲,安徽积极与长江三角洲建立合作关系,江西要对接长(长江三角洲)珠(珠江三角洲)闽(福建),山西则一直谋求加入环渤海经济圈。对此,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部一些省份为谋求“龙头”老大地位而各自为政,他们纷纷担心这种“无序状态”会离散中部地区的实力,并最终制约中部地区的崛起。不过对此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中部各省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积极融入东部三大经济圈正是他们发挥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举动。其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三大增长极基本上各具经济特色,中部各省各自寻求自己的合作伙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结构同构而导致恶性竞争,建立在差别性和互补性基础上的合作更能趋利避害,走向互赢。

2、培育推进型产业和中心城市。第一,增长极的形成必须拥有创新能力强的主导部门或产业,这些创新能力强的部门或产业将推动集区位经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于一身的增长极的形成。中西部地区推进型产业的培育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 and 已有的产业优势,避免“飞地”经济再次产生。中部地区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也已崭露头角。以湖南为例,湖南的新材料工业、生物医药产业、文化电视产业和光机电一体化重型机械产业都已赶上或超过东部地区,有的甚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高端产品和产业是最宝贵的资源,不断挖掘它们的潜能,以推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勃兴。西部石油、天然气、铜、铁、铅、锌等矿产资源丰富,加工业初具规模,如果我们利用高新技术对丰富的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并对已有的产业和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它们都有可能成为推进型产业。第二,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和增长极的载体,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中西部地区目前尚缺乏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领跑作用的中心城市。2007年6月,西部的成都、重庆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又一起被国家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可尝试以四个“新特区”为一级中心城市,以太原、郑州、合肥等省会城市为二级中心城市,推进型产业向各级中心城市集聚,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

3.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一般而言,增长极的类型从其形成原因上看有两种:一是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或发达地区积聚而自发产生;二是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主动建立。^[4]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的构建主要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援助。一方面,国家在信贷、税收、投资决策方面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具有增长极潜能的城市群应赋予更大的对外开放的权限,鼓励他们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其经济活力;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鼓励人才和资金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更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快速的交通网络和高速的信

息网络,打通中西部各省之间以及它们与东部的交通和通讯动脉。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尚处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初始阶段,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是现阶段的战略重点,便捷的交通网络有利于增长极的生成。随着增长极极点的逐渐增多,点与点之间通过这些交通轴线相互连接,吸引资金、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这种点轴互动的模式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助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实。

参考文献:

- [1] 安虎森. 增长极理论评述 [J]. 南开经济研究, 1997 (1).
- [2] 世界银行 1984 年经济考察团. 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方案主报告 [R]. 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 1985: 97.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4] 许良军. 增长极理论与落后地区开发 [J]. 云南社会科学, 1995 (5).

(责任编辑:徐 蓓)

(上接第 112 页)

可由湖南省政府委托省旅游局牵头,由“泛长株潭”8市旅游、交通、环保等相关部门参加。其主要职能是根据一定的目标和原则签订区域旅游合作协议、框架、联合宣言等,作为“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合作的依据和指导;制定区域旅游合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定期诊断和解决内部冲突或争端,为未来的合作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从而达到“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合作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和统一实施的目的。

8.健全旅游法律法规,提供与区域旅游合作配套的法制环境。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培育壮大旅游支柱产业,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法制环境。“泛长株潭”地区的旅游主管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旅游相关法律和《湖南省旅游管理条例》,督促“泛长株潭”8市旅游局加快制定各市旅游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加大旅游执法力度,规范从业人员经营行为,

打击各种违法活动,做好相关社会治安、交通安全、设施安全、卫生防疫等工作,完善旅游行业管理,为“泛长株潭”旅游业的合作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法制环境。

参考文献:

- [1] 马 波. 旅游业的转型与区域旅游合作 [J]. 旅游学刊, 2007 (5): 8 - 10.
- [2] 周强省长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B/OL]. [2008 - 04 - 03] <http://www.hnt.gov.cn>
- [3] 熊柏隆. 大长株潭“3+5”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走势研究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8 (2): 6 - 10.

(责任编辑:徐 蓓)